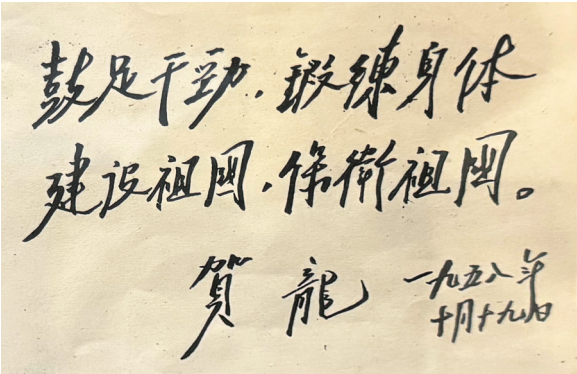


红色收藏



贺龙为山西省第一届运动会题写的祝词（作者供图）

山西省体育博物馆中有一件格外引人注目的珍品，是贺龙在1958年为山西省第一届运动会题写的祝词：“鼓足干劲，锻炼身体，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这16个字的题词，透出开国元帅、新中国首任国家体委主任对体育事业的殷切期望。

1958年10月19日至27日，山西省第一届运动会在太原市杏花岭体育场馆隆重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山西体育史上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综合性运动会，全省各地和部队的2031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参加田径、篮球、排球、摔跤、武术、拔河等项目的比赛。更为盛会增添光彩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亲临开幕式，同行的还有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陈奇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贺龙在开幕式上为大会欣然题写上述祝词，将体育锻炼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彰显了那个时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引领下，体育被定位为“为国防与经济建设服务的人民体育事业”。贺龙的16字题词，体现了他希望将个人强健与民族振兴有机统一的愿望。在“体育强则国强”的信念感召下，20世纪50年代，机关、学校、厂矿纷纷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呈现出蓬勃生机。

山西省第一届运动会的召开，是山西体育事业长期积淀的结果。早在1950年5月，山西就曾举办过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全省人民体育运动大会。1958年10月的这届省运会，是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的召开，将省运会同全运会届数序列相吻合而专门举行的。这届盛会上，打破了2项全国纪录，刷新39项省纪录，涌现出1150名等级运动员。自1958年首届至今，山西省运动会已成为山西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大型综合性体育运动会。自1994年第九届起，省运会正式固定为四年一届。

王荣

商代“自拍杆”

岳娴



商代兽面纹策柄（山西博物院藏）

山西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青铜器因造型酷似“自拍杆”而在网络上引发关注。这件器物实为商代晚期的兽面纹策柄，是古代驭马工具“策”的柄部，也是汉语词汇“鞭策”的实物来源。

该策柄1985年出土于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的商代墓葬车马坑中。灵石旌介遗址是晚商时期“丙”族方国的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多见“丙”字族徽，表明此地曾是商代“丙”族的聚居地。这件策柄通长约30厘米，呈长条形中空柄状，一端略粗，顶端有弧形卡口；另一端稍细。整体形制与“自拍杆”确有相似之处，但功能截然不同。

在古代车马具中，驭马之具有“鞭”与“策”之分。据文献记载，鞭为柔软的丝麻或皮革制品，用于抽打马匹；策则是硬质长柄器具，顶端可加装尖锐构件，用以击刺马匹，促其疾行。此件青铜策柄即为“策”的柄部，其顶端的卡口正是为了安装刺马的金属件而设计。两者配合使用，合称“鞭策”。《礼记·檀弓下》有“鞭策其所不及”之语，其本义即指以鞭、策驱使马匹，后引申为督促、激励之意。

从工艺角度看，该器物展现了商代青铜铸造技术与装饰艺术的融合。策柄前端卡口处装饰一浮雕牛头，是纹饰的视觉中心；两侧对称雕琢兽面纹，这是商代青铜器上最常见的主题纹样，线条细密庄重。柄身满布整齐的空梭纹，尾部饰以凸弦纹。直棱纹不仅具有装饰性，还能在握持时起到防滑作用，说明商代工匠已在实用性与美观性之间取得平衡。



《孔子步趋图》石刻（晋祠博物馆藏）

步趋图里见师道

郭悦

柳林又见刘王庙

刘勇



柳林刘王庙外线碑

三川河流域是吕梁山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心。东汉后期，西河郡治与南匈奴单于王庭自陕北迁入，离石为西河郡治，左国城为南匈奴单于庭，南匈奴自此定居吕梁。西晋末年，南匈奴首领刘渊在离石左国城建立汉国，称大单于、汉王，成为十六国时期北方第一个独立建政的胡族政权，是民族融合史上的重要篇章。北朝后期，留居吕梁山区的南匈奴后裔与迁入的其他各族人群融合，被称为稽胡（山胡）人群。因刘渊建立匈奴汉国的功业，他在稽胡人群的祭祖等社会活动中，始终具有深远影响。

近年来，笔者在吕梁山区考察中发现多座刘王庙，即刘渊祭祀场所。刘渊谥号汉光文皇帝、庙号高祖，称帝前称汉王，祭祀场所名称因此各异：有的以谥号命名，如离石陈家塔村元汉光文皇帝庙；有的以庙号命名，如汉高山汉高祖庙；有的以王号命名，如离石东汉王庙；有的直呼其名，称刘渊祠或行宫；还有的以姓氏命名，称刘王庙，如汾阳花枝村刘王庙等。笔者曾推测，这类深藏偏远山区的刘渊祭祀地还会不断被发现。

果然，近期在柳林考察期间又见刘王庙。山上的慕家垣村地处深山，原本交通不便，近年来公路提升等级，直达该村。此地有一山沟，居民居住在沟的两侧，沟东北部原为刘家沟村，沟西南部为慕家垣村，后两村合并为慕家垣村。

慕家垣村东山巅的祭祀建筑现称大庙、天神庙，旧称刘王庙。由柳林县城沿三川河东北行，沿山道蜿蜒上山约12公里至柏油路尽头，便来到黄土山区深处的山顶区域。此地慕家垣、堠头、芦家峁三村之间，山顶平台上有庙，正房为三口窑洞，早年坍塌，近年三村民众集资复建，已非古建原貌。现正房三

窑，对面新建戏台，中窑供天地神，东侧窑供刘王神，西侧窑供龙王神；东侧前接一小房，内有土地、山神、雷公、电母像。

正房前立两通清代修缮石碑，分别为清雍正、光绪年间所立，碑面风化，部分铭文可读，大体可见当年供奉神明情况。庙外另一残碑，轻拂尘土可见：“至正辛巳年间曾建庙于山之岭……”后述修庙事。至正辛巳为元顺帝至元年（1341），由此判断，此庙至少在元代已有。

其主神为众神崇拜，如皇天后土神、刘王、龙王、土地、山神等。随着时代发展，神明也在增加，如土地、山神不见于雍正碑，而出现于光绪碑，符合清代民间众神崇拜趋势。正因神明众多，此庙又称大庙、天神庙，但其最初名为刘王庙。

慕家垣村刘王庙祭祀众神与吕梁地区发现的多座刘王庙高度类似。考虑到原刘家沟村距山顶刘王庙更近，此庙最初应是刘家沟村居民祭祖之地。由此可以认为，慕家垣村刘王庙最初主神为刘渊，此地刘姓应是稽胡后裔中的刘氏，故有祭祖建庙之举。山巅视野辽阔，具有一定军事价值，也符合中古时期稽胡人群的居住安全需要。慕家垣村慕姓为鲜卑著名姓氏慕容所改，鲜卑系慕氏来此定居要晚于稽胡系刘氏，但长期共同生活后，也逐渐接受刘王祭祀。

目前此庙由慕家垣、堠头、芦家峁三村共同维护。至今每年农历正月、七月，附近各村民众仍相约祭神，举行盛大庙会。今天的村民可能已不了解稽胡人群祭祖过往，但千百年来祭祀活动延续至今，正是十六国北朝吕梁山区胡汉民族融合发展历程中刘渊祭祀现象的又一珍贵实例。

本文图片由作者拍摄



修缮后的柳林刘王庙



《韩熙载夜宴图》故宫博物院藏

千年夜宴

郭冰

8月22日，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太平年 天下同宁”大展开幕当天，故宫博物院藏《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作为压轴“彩蛋”正式亮相，展期仅一个月，至9月20日结束。这幅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绢本长卷，上一次公开露面还要追溯到2011年的故宫博物院的一次展览。

作为文博界当之无愧的顶流国宝，《韩熙载夜宴图》卷长28.7厘米、横335.5厘米，绢本设色，传为五代南唐画院待诏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所作，现存为宋摹本，1959年入藏故宫博物院，并被列入《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极少离馆。关于它的创作缘起，文献留下两说：《宣和画谱》记载李煜“颇闻其荒乱”，却又“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五代史补》则认为是李煜“知其荒乱，虽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过，因命待诏画为图以赐之，使其自愧”。这幅画从诞生之日起便带有强烈的“政治侦察”色彩。

长卷以屏风、床榻、长桌等家具为隔，将一夜宴饮收束为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五个首尾呼应的段落，共绘人物46人，韩熙载本人在每一段中反复出场，构成连环画式的叙事节奏。开篇听乐，韩熙载峨冠危坐，与状元郎粲同听教坊副使李家明之妹弹琵琶；转入观舞，家伎王屋山跳“六么舞”，韩亲自击羯鼓，是全卷最跃动的瞬间；暂歇一段，烛光摇曳，节奏放缓；清吹之中，韩换便装、执扇而坐，五名乐伎吹奏笛箫；终段散宴，韩持鼓植立于宾客之间，目光仍难见欢悦。顾闳中高明之处，正在于细致再现了弹丝吹竹、清歌艳舞的热闹场面之余，深入刻画出主人公“超脱不羁、沉郁寡欢的复杂性格”。在南唐国运衰微、朝堂倾轧加剧的晚景里，这位北地南奔、心怀平定中原之志的士大夫，选择以纵情声色行自我放逐，而李煜派出的“画家密探”则将这场夜宴定格为一桩被权力凝视的政治物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宋摹本本身就是一部层累而成的“历史文本”。画中国家伎所穿襦裙腰线下移，韩熙载所戴高纱帽形制接近宋代“东坡巾”，青瓷壶碗、烛台等器物也与宋墓出土及宋画所见一致，种种细节表明它并非顾闳中真迹，而是宋人据原作精心转摹的版本。

北周石韵

邢占平



北周释迦立像（作者供图）

山西古建筑博物馆藏有一尊北周释迦立像，石质，通高306厘米，1957年征集于山西省猗氏县孙里村。这尊造像诞生于公元6世纪的北周，保留了当时政权更迭与文化交融的实物信息。

从造像的形貌特征来看，具有鲜明的时代辨识度。佛像高肉髻，饰以排列规整的螺发，面相丰圆，弯眉细长，双目微闭，鼻梁挺直，唇线清晰，面带若有若无的慈和笑意，整体保留了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以来中原造像秀骨清像的审美余韵。然而细观其体态与衣纹，则呈现出另一番气质：佛像身披通肩袈裟，袒露右胸，小腹微微前挺，衣纹不作繁复的折叠，而是以简洁利落的阴线刻出，线条刚劲有力，转折方便，明显带有鲜卑民族服饰宽博、实用的特征。尤为特别的是双手的姿势：右手屈臂上举，施无畏印，左手自然下垂，以绢帛缠绕，庄严肃穆中有几分灵动。这种中原式的面容与鲜卑式的衣纹、体态共存一体的现象，正是胡汉两种艺术特质在北周佛教造像上的直观糅合，也是当时社会文化多元并存的物质投射。

究其原因，北周国祚仅24年，系宇文泰家族取代西魏所建。为巩固鲜卑贵族的统治根基，宇文泰刻意推行“胡化”政策，试图扭转北魏孝文帝以来全面汉化的趋势，在制度、服饰、文化认同等方面重新强调鲜卑族本位。这尊石佛造像正是这一政治转向的实证。